

# 走过长征路

中央红军老战士黄赞琦回忆录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 走过长征路

中央红军老战士黄赞琦回忆录

主 编：洪汉文

执行主编：彭长明

责任编辑：胡嘉峰

# 代 序

陈仕其

黄赞琦同志1913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宁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3年8月参加革命，193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先后担任红一军团警卫员、班长、副指挥员，一一五师后勤部副科长、辽东军区后勤部生产处副处长，第四野战军三团供给处处长，司令部科长，后勤部中南军区财务科科长。1954年11月由部队转业先后担任广东省供销社财务处副处长，韶关国营林场场长，连山县委财贸办书记，连山县委工业办书记，坪石矿务局供应处第一副处长，惠阳地区气象局局长，惠阳地区财办副主任等职。1979年4月离休。

黄赞琦同志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历尽艰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英勇作战，多次立功受奖，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先后在财贸、工业、林业、气象等系统工作，并连续三届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无论在哪个地方，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服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与人为善，淡薄名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担任领导干部期间，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以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作

风赢得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好评；他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忠诚地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离休后，黄赞琦同志始终保持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市的经济建设，关心我市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清醒、立场上坚定、旗帜上鲜明；在生活上，保持和发扬了老一辈革命者的高尚情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从来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额外要求。他的崇高品质、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音容已杳，德泽长存。”黄赞琦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老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他坚定理想、投身革命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优良作风，学习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高贵品质，为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法制社会、和谐惠州，实现全市人民的富裕安康而努力奋斗。

（本文系中共惠州市委副书记陈仕其2005年9月13日在黄赞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摘要）

# 目 录

代 序 .....	陈仕其 (1)
一个中央红军老战士的回忆 .....	黄赞琦 (1)
前 言 .....	(3)
贫穷的童年和青少年 .....	(4)
参加红军干革命、走长征路 .....	(8)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	(29)
参加地方建设 .....	(47)
安享晚年，发挥余热 .....	(59)
我的家庭 .....	(69)
后 语 .....	(87)
亲朋追忆和媒体报道 .....	(91)
悼念我的父亲 .....	黄南下 (93)
老伴的临终交代 .....	袁淑英 (108)
老局长，您在哪里？ .....	邓锐钧 (111)

怀念我的老红军领导	赖兆周	(114)
党和政府对黄赞琦的关怀	袁淑英	(118)
纪念父亲黄赞琦去世一周年	黄安东等	(126)
老红军黄赞琦畅谈烽火岁月		(128)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记红军老战士黄赞琦		(131)
“党兴国兴民兴”		(133)
他的经历就是一部生命传奇		(135)
编者的话		(140)

# 一个中央红军老战士的回忆

黄赞琦







## 前 言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一个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中央红军老战士，一个老共产党员。虽然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写的这些回忆，只不过是把我自己从一个贫穷山村农民儿子的青少年生活磨难经历，到参加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三年的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等过程记录下来。这些都是我一生中的亲身经历，是真实而又平凡的经历，希望对后人有益。

## 贫穷的童年和青少年

我1913年6月8日（民国二年农历五月初四），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刘坑乡赖坑村三坑（该县新编县志为宁都县梅江镇赖坑村委三坑）一个贫穷的山村农民家中。我在那里渡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1933年8月参加红军离开后直到1951年以后，才有机会带家属回家乡看看。

父亲黄敬钫，农民，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母亲温氏，也是本村人，一个旧社会缠小脚的农家妇女。有一个哥哥叫黄赞寿，一个弟弟叫黄赞儒。全家5口，只有一间破房。我的老家处于山沟，出门就见山，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村里几十户人家都饮用这小河水。文化相当落后，虽有一间十来个人的二、三年级小学，但在那时的旧社会只是有钱人才能读得起书，女孩子无读书的自由，我们是因为太穷才没有读书，是睁眼瞎子。

1920年6月14日，父亲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那年我只有6岁。哥哥10岁给地主做长工，还有一个2岁的小弟弟，因父亲死时无钱埋葬，母亲只好狠心将小弟弟黄赞儒卖给他（现仍在老家）。在旧社会里失去了父亲，



母亲又没劳力，亲朋邻居更不过问我们，完全是饥饿没得吃，寒冷无衣穿。在当时父亲死后一二年虽留下一间破房和地皮，也给我的一个亲叔卖掉，我们却分文没拿到，都给他独吞了。虽有亲叔，但他根本不管我家，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

母亲因小脚没有劳动力，为了养活两个幼儿，只好另嫁人。我和哥哥跟随改嫁的母亲到邻近的忠芯坑村的高宜周家落户，高宜周成了我的养父。养父家也是贫穷的，除有三间房屋外，别无他物。他家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没有子女，就把我们兄弟俩当成是他的亲儿子来看待。连我们母子3人一家共5口人的生活，全靠养父一人磨豆腐卖点钱来维持。母亲为减轻养父家的负担又把我送回老家亲叔家养。我这个亲叔对我是很苛刻的，有时给我吃，有时又限制我吃，所以我对这个亲叔一向没有好感。后来养父知道我的情况后又把我接回他家养育，一直到我母亲逝世，那年我才13岁。1933年8月20岁的我参加了革命，就在当年冬天我养父也去世了，终年60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好心人，我真是一直忘不了他。1951年9月底，我回老家看望继母，同时为母亲、养父扫墓，这时发现在母亲的墓碑上我兄弟俩被刻写姓高（高绍承、高绍福），参加红军后我在连队花名册上填写姓黄，用的就是现在的名字。



# 走过长征路

一个中央红军老战士的回忆

我在旧社会里受尽折磨，八九岁时就早起给人家放牛直到下午才得到一个铜板，没有牛放时就上山砍柴，到13岁那年回老家村庄帮人（老板是吹喇叭的黄敬海）做小长工，讲好一年给我一套衣服，干的活是上山砍柴下田锄草。直到农历九月因母亲生孩子得病，我就回家照顾母亲，要到外地外村采中药，有的村虽然不认识人，但那些村民都大力支持、帮助，找到药后我就拿回家煮给母亲吃，结果母亲还是医治无效，逝于同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终年40岁。

到年底年三十那天下午，这时已家家放鞭炮，我和哥哥一起到黄敬海老板家要点钱过年，结果别说是衣服就连一条破布也没有要到，做了9个月的工全是白干了，我兄弟俩只好哭着回到养父家。

我十四岁那年养父把我送去当学徒，学做篾匠手艺活。以前当学徒是要交钱给师傅的，但养父事先跟师傅说好，学徒不交钱，在学徒期间不准打骂我，这是养父对我的关心，我心里非常感激。师傅也是个忠厚人，这些条件他都答应了。3年学徒期满后，第4年我还跟师傅做工，不过不是学徒了，在他手下做手工艺，他每月给我30毫钱做工资，相当于当时的3块光洋。哥哥那时仍做长工。

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在旧社会里认为寡妇嫁人耻

# 走过长征路

一个中央红军老战士的回忆



辱，因此我们小辈也被人看不起，我虽小但有志气，宁可饿肚子也不去向别人要东西吃。有一次，村里有人出主意，要把我卖给人家，那家还有个现成的童养媳17岁，我哥问我去不去，我表示坚决不去，我哥都同意说对，要为父母争气。



## 参加红军干革命、走长征路

1930年冬，红军的一支部队（一个连）来到三坑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和发动贫苦群众成立村苏维埃政府，选出村主席，都是贫农担任。少先队、妇女会、农民协会、儿童团先后组织成立，我参加少先队，负责站岗查路条（通行证）。这支红军部队在任务完成后大约一个月被调回宁都县城，就在那时，我哥黄赞寿下午上山砍柴约定的三个人，就一起偷跑到县城参加红军，他走时并没有告诉我，那时我已17岁了，我估计哥哥可能想留下我照顾年迈的养父，所以不告诉我。他走前在做长工，东家晚上等他回来吃晚饭，但没见他回来，过了几天后，有人挑柴到县城卖，看见他背着驳壳枪，回到村里说时，我才知道他已参加了红军。

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一、二、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三次“围剿”都被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调动了四十万国民党军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的指



挥下（毛泽东主席被调离对红军的领导权）又取得了胜利。蒋介石还不死心，于1933年又调动了一百万国民党军队向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围剿”，并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采取了堡垒政策即步步为营的战术。那时王明（王明走后是博古和德国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他排斥毛泽东，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并把毛泽东调到地方工作，离开军队，由他自己来领导军队和指挥这次反“围剿”，他用的不是游击战而是采取正规战，同强敌拼消耗，结果红军力量被严重削弱，伤亡损失很大，根据地不断缩小，陷入了困境，形势岌岌可危。

1933年这年的形势十分严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征兵动员令，凡是贫雇农子弟16岁以上的都要动员出来参加红军。一时根据地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特别是青少年参军更是热火朝天。1933年8月，我就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这些小伙子在区苏维埃政府报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活动后，便送到宁都县城进行训练，同时，兴国、瑞金、长汀、建宁等县的青年团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地团委负责干部的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镖、长枪，成群结队向宁都集中，踊跃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参加的就



有一万多人，其中青年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9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大校场汇集，接受旗帜番号正式誓师成立，正式建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五师，下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3个团，师长吴高群（不久后牺牲，由陈光接替），政委冯文彬（不到一个月即由年仅19岁的肖华接任）。那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团中央和江西省军区都派了代表来出席大会，会上授给组建“少共国际师”的有功人员一枚“武装上前线”的五星银质奖章。我被编入少共国际师，我们同时参军的同伴编到四十四团三营八连。

我们部队为什么叫“少共国际师”，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才了解到，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简称少共中央局）向中革军委申请，被批准后组建的，全称是“少年共产国际师”。组建过程中周恩来、朱德非常关注。

“少共国际师”成立以后，就开赴石城，进行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那时，我们的武器只有各自带来的红缨枪和大刀。后来红三军团打下了福建沙县，消灭了敌人一个师，缴获的武器送给我们装备起来，大家学习训练的情绪就更高了。这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于是“上前线去”、“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土地革命利益”已成为战士们一致的呼声。十月初，年轻的



“少共国际师”便开往前线福建地区，在一次次艰难的战斗中得到考验和锻炼。

我们连开赴到福建建宁县驻守，任务是保护后方医院和兵站，我们这个连住在一个祠堂里，这时我被调到连部当通讯员。我们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新兵，只有三排长是老兵出身，全连一百多人只有几条汉阳造老枪，我当通讯员才给一支双套筒枪，还不好用。有一天早晨，刚吃早餐就听到外面枪声四起，门口二个站岗的哨兵不见了，我作为通讯员就要主动到外面看究竟是什么事情，刚出门就见到一个头包红布手持梭镖的土匪（大刀会）在前面，离我们不到五米远。新兵没打过仗，有枪都不会用，我们的老兵三排长眼疾手快，从新战士手中夺过一支枪，端起一枪就把最前面的土匪打死了，后面的土匪才不敢前来，后来其他友邻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土匪，并将他们消灭了。我们这些新兵小鬼当时吓得像被赶的鸭子一样四处乱跑，在祠堂里面团团转。这次战斗经历，给了我们这些新兵一个很好的锻炼，以后遇到有情况都会胆子大了些。

当时，敌人采取了碉堡政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依靠坚固的碉堡，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八方攻来。但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及军事指挥者（李德），对于强大的敌人，错误